

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念

赵馥洁

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论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论述,表现了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新高度,标志着党的文化自觉的新境界。这些论述的主要观点是: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克己修身的经验宝库;传统文化是升华精神境界的智慧源泉;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概括这些论述的精髓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割裂的精神家园,永远不能割断的精神命脉。

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

为什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好好思考。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值的必然趋势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历史特征是:博大卓越的文化成就,持续连贯的文化传承,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稳定统一的文化特质。

中华文化成果的博大性(“博而不浅”)、承传的一贯性(“续而不断”)、体系的统一性(“聚而不散”)和特质的稳定性(“定而不乱”),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无须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许多落后、保守、腐朽的东西,也无庸讳言,17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缓慢,落后于西方的步伐,但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丽珍宝是主要的,健康积极的内容是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1世纪的升值是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需要。

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精神家园、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民族衰落的根本标志是文化衰落,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是文化复兴。文化与民族的关系比政治制度与民族的关系更根本、更内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内涵的中国梦。其目标有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其实现条件和途径有三: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可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实现中国梦之精神力量,也是中国梦包括的目标内容。

2、坚守民族主体性的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滚滚洪流容易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独特性弱化甚至消失,特别是在当今还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会利用全球化趋势压抑、削弱甚至淹没其他文化,使非西方文化面临衰落甚至消亡的危机。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实质是为西方文化抵制和消解非西方文化提供战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质是宣布西方文明的唯一合理性。因此,弘扬、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关系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问题,是关系坚守民族文化独立性、主体性的大问题,更是关系中华文化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传统文化是民族主体性的深层结构,是民族的身份证、护身符,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标志。因此,维护一个民族生命的根本是维护它的文化,坚守民族主体性的灵魂是坚守它的文化。高清海在《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一文中说:“在当今现代化的全球浪潮中,人们讲求的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学术规律、西方的哲学原理,乃至西方的生活方式,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已经置诸脑后渐渐被淡忘,可以说剩下的并不多了。……我们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或者在工作中寻求哲学根据,乐于从西方哲学名家的思想中去汲取营养和兴趣,那仿佛是早已死亡了的东西,属于历史的陈迹,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这个境况不是可以令人乐观的。……凡是西方好的,有用的都应该去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因此丢弃了我们的‘自我’,失去了我们自我的根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那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的罪人了。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标志文化特质、体现文化灵魂的哲学思维传统,历史证明,那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终究要被淘汰出局的。”

3、解决新世纪社会问题的需要。21世纪是全球问题从生的时代。第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资源短缺,人口增加,危机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地球已不堪重负,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我们这个世界足以供应人类所需,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第二,人与人关系紧张,全球社会危机严峻。一进入新世纪,世界上许多矛盾都展现开来。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矛盾,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矛盾,强权政治与多级政治的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南北贫富矛盾,边界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存在、扩大,招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第三人的内心矛盾,冲突加剧,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肉体与灵魂、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理性与情感、公与私、人与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生命与道义等在矛盾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战场。于是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精神疾病、心理变态等问题,会成为21世纪的精神态势。何去何从,关键在于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要更新生存智慧,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必须先对引起当代全球各种普遍性问题的观念进行反思。拉兹洛说: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在西方文化支配下,形成了一系列错误观念:资源无限观、机械自然观、生存竞争观、市场均利观、超前消费观。此外,还有个人至上、效率崇拜、科技万能、金钱万能等等。

这些观念的哲学根源是近代理性。这种理性的世界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本位主义,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因此,21世纪要走出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存智慧,必须求救、求救于中华文化。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感兴趣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哲学家冯友兰逝世前说:“中国哲学在21世纪将大放异彩。”国学大师季羨林说:“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思想家李泽厚说:“该中国

哲学登场了!”

二、传统价值智慧是核心价值观的丰厚资源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龙魂”,“千秋圣哲铸龙魂”。

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总之,自然与人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说,价值论渗透于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哲学问题环绕的核心。我认为,如果就哲学形态而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

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哲学价值论是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諧为真善美统一之理想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包括着六大基本观念:

(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所谓“天人合一”,是认为人与天地、人与自然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共处于宇宙统一体中。中国哲学中除少数哲人主张天人相分外,多数哲学家追求天人合一,并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儒家从孟子的“知其性则知天矣”,《易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发其端,中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始终在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他们认为,人在宇宙间诚然有崇高价值,但是天生的,人的心性之与天的德性相通,天是人之本,人是天之心,天与人应该处于和谐统一体中。他们还指出,天人合一的基础是“诚”,枢纽就是“仁”,张载云:“天人合一存乎诚。”程颢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在诚和仁的道德中合为一体,融为一体。道家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导其源,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扬其波,中经魏晋时“名教与自然合一”,到宋明时的“乐天”观念,也一直在向往天人合一的至善理想。不但古代哲人提出了一系列天人合一观念,包括自然与人合一、天性与人性合一、天理与人德合一。而且文学家也抒发天人合一的情怀,例如,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辛弃疾:“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哲学认为天与人处于尖锐的对立中,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人只有在同自然的对抗中才能发展的观念大异其趣。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不但解脱了人对天神的恐惧,避免了宗教迷误,也消除了天人之间的敌对精神力量,使人与自然和谐,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保合太和”的和谐观念

中华文化认为,作为整体的宇宙,其状态是和谐的,宇宙是一和谓体。所谓“和”,就是宇宙间各种不同的,有差异、有矛盾的事物和要素,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平衡,从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状态。《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传统和谐观念包括:

1、和谐宇宙观。《周易象辞》云:“乾道变化,名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明确提出“太和所谓道。”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解释说:“太和,和之至也。”

2、和谐自然观。《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荀子·天论》云:“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宜(宜)以成。”

3、和谐天人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庸》:“人与天地参。”

庄子:“与人者和,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4、和谐人际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5、和谐社会观。《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6、心灵和谐观。《管子·内业》:“彼心之情,制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

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理想既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又包括人与人和谐。

在中国哲学中“和”与“同”是相反的概念,“和”是多样性的协调,而“同”是单一性的重复。哲学家明确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哲学观点,确立了“取和去同”的价值主张,并运用这一哲学思想论证了“尚和”的治世原则:“礼之用,和为贵。”

(三)“生生日新”的更新观念

宇宙不但是整体,而且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生生”、“日新”是中华文化的又一重要观念。“生生”就是不断新生,“日新”就是日日更新。中华文化有其高尚文化、主更新的内在素质。

《周易》就既讲“变易”,又讲“生生”,“日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说“温故知新”。孟子说“新子之国”。《礼记》言“新法”。《大学》讲“新民”。

张载咏新德,“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朱熹赞新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宇宙不是一个机械结构,所以中国哲学不重“结构”,而重“生成”,“生成”是一种生命洪流,它奔腾向前,永不止息;它不会中断,也不会分裂。在中国哲学家眼里,宇宙的形象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片生意,一股洪流,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春来遍地桃花水”。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既不是上帝的意志,也不是人的支配,而是万物的“自化”,“生生不息”就是中国古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四)“人为至贵”的主体观念

中国哲学价值论的出发点认为是人类有高于一般动物的崇高价值,这一观念经历了一个历史形成过程。

1、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观念——“人本”思想的孕育

西周初期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2、春秋时期的“民为神主”观念——人本思想的萌芽

春秋初年的随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同时期的史墨也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宋司马迁说:“祭祀以人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春秋后期,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宇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

3、战国时期的“惟人最灵”观念——人本思想的形成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明确提出:“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尚书·泰誓》提出“惟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三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哲学生人本思想的形成。

4、“民为本”——人本思想的政治化

人既然是天地的中心,宇宙的主体,那么对于治国、治世来说人就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力量和因素。一个国家的兴盛,一个社会的进步,一种事业的成败尽管需要诸多因素和条件,但是首要的根本的是要依靠人的力量,发挥人的作用。对此,中国古代哲人有着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亢仓子·神道篇》曰:“夫国以人为本,人安则国安。”罗钦顺云:“世道之升降,系于人不系于天。”(《四库》)这种“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从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上来阐发人的作用的,如果从君民关系上弘扬神的巨大作用,“以人为本”就成为“以民为本”。《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可以理解为安定、团结,意思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老子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孔子指出:“民以君为天,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缙衣》)。孔子还曾形象地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春秋谷梁传》则说“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政治家贾谊云:“夫民,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又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而且具体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新书·大政》)。根据“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哲学家们进而提出了“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为政之道。唐太宗李世民则从隋亡的教训中,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的道理。唐朝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代中叶著名思想家丘濬(1421—1495年,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事虽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大学衍义补》卷13)因此,他一再劝谏最高统治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守于座右,以铭心刻骨者也。”(同上)

“人贵”不仅是对“物”而言,而且也针对“神”而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等观念,明确表示了这种重人轻神的倾向。“人贵”观念支配着中国人一直以现实的理性态度,对待社会人生问题,不耽于抽象的思辨,不溺于神秘的信仰,不执着追求超越人间的彼岸天国。宗教价值意识甚为淡薄,现实价值热情相当浓厚。“人贵于物”的价值本位观念,形成了相信人的道德和力量以创造价值的优良传统。“民惟邦本”的政治观念,对民众作为国家兴盛、社会发展、政权巩固的决定因素的充分肯定,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生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识是建构“民主”价值观的思想根基。

(五)“义以为上”的道德观念

中华文化价值指向是“义以为上”,以道德为至上价值。《论语》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利然后取”、“杀身成仁”、“仁者,爱人”。

老子:“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柔胜”。

孟子曰:“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舍生取义”。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荀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三不朽。”

《易传·系辞上》:“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盛德大业至矣哉!”

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生智慧是:儒家教人“心安理得”地活着,道家教人“心旷神怡”地活着,佛教教人“心平气和”地活着。儒家教人“举得起”,道家教人“放得下”,佛教教人“看得开”。

道德价值高于功利,主张“义重于利”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关于义利观的价值地位问题虽说有种种争论,但儒家义重于利的观念基本上占统治地位,墨家、法家的功利主义,道家的“义利双弃”都不是主流。“义重于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认为物质利益有一定的价值,二是认为道义原则的价值层次高于物质利益。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价值论对个人私利有所忽视,对社会公共物质利益也注意不够,但却十分崇尚道德价值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道德被提高到天道、天理的地位,被视为宇宙法则,利欲则成了要“灭”、要“去”的对象。与此相比,西方哲学则比较重视利益价值,到近代,西方人为个人利益而竞争的观念更为突出。中国哲学“义重于利”的观念,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和积累社会财富,无疑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却促使人们瞻视道德修养,重视精神生活。抑制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这种现象的滋长和蔓延。

关于道德和实力(物力、人力、权力、武力等等)的关系,总体上主张德高于力,即认为,实力虽然有一定的价值,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但“力”的价值层次低于道德。儒家德高于力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德力观的主流,它和义重于利



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价值哲学中的两大理论支柱。德高于力的观念,是政治上“为政以德”,外交上“修文德以来之”,教育上“明人伦”、“明明德”,人才上“惟贤惟德”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主张“义重于生”。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

高尚的道德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仁爱等。

(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孔子:“为政以德”,“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

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大同理想社会。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和谐理想。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观念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和根基。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建构核心价值观念的丰厚资源。我们特别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道德、“民本”意识、“诚信”信念、“正义”精神、“和合”思维、“大同”理想等观念。

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是返本开新

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不能重物轻质精神、不能重利用轻弘扬,不能重赚钱轻育人,更不能通过“大话”“戏说”“恶搞”等手段将其庸俗化、低俗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传统重新认识,重新发掘、重新阐释,继承创新。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即返本开新。就是说,使凤凰在烈火中涅槃,在涅槃中新生。

1、情存敬畏,理达自觉。近代以降,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的节节败退,中国人急于走出衰弱的困境,挽救民族危亡,不断探索落后的原因。不少中国知识精英认识到落后与教育有关。于是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另方面反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间出现了否定传统的思潮。五四时期,胡适提出“全盘西化”,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吴虞呼吁“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傅斯年主张“废除汉字”(“汉字是牛鬼蛇神”)等等。尽管他们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严肃的。但却为以后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埋下了伏线,直到文革时期的“批儒”、“批孔”。从五四到文革结束,期间近六十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主导态度是批判否定的,甚至是全盘否定。这个误区、误导,危害深远,几乎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疏离、隔膜和遗弃就与这种误区相关。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一些人眼里,只知道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传统丰厚而悠久的中国只剩下“舌尖上的中国”了。现在在我们走出这种误区,这种浅薄,这种无知,实现文化自觉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该自觉地认识到孔子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而我们一定需要孔子。如果我们不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精神血脉将会断裂,精神源泉将会枯竭,精神家园将会失落。中华民族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将会成为无精神生命的行尸走肉。这个民族也将名存实亡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仿天学、见利忘义的道德沦丧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情感上心怀敬畏、敬仰和敬畏之情,进而在见识上全面认识她的源流、特征、优长、价值、局限、地位、命运和前途。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维护基元,返本开新。既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又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既保持灿烂悠长的传统精华又体现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还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

3、名实相符,知行合一。孔子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每个社会身分,社会角色的行动事实符合该身分的概念、理念所蕴涵的标准、规范和原则。这是以本质要求现象,以原则要求实际,以理想提升现实,以自觉升华自发。孔子主张正名的目的是使人的价值实际符合价值观念。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王阳明所谓的“知”不是一般地认识,而是指人的价值自觉特别是道德价值自觉;王阳明所谓的“行”不是一般地实践,而是指人的价值践履特别是道德价值践履。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的,因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说一个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自有知在。”“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宗旨是使价值观念落实于价值实践和行动,通过践行使价值观念实现、落实。中国传统哲学的名实相符、知行合一观念启示我们继承传统的优秀精华,必须落实于行动,体现于实践。

4、内化生命,外推世界。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传统精华特别是道德精华内化为每个国民的精神、心灵、血脉,成为个人生命的智慧和人生的寄托。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要提升文化自信,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西方国家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设孔子学院,至今我国已在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近40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就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使中华文化中蕴涵的价值智慧让世界共享。

赞中华价值智慧

浩荡神州慧海深,千秋圣哲铸龙魂。
孔孟义起超生死,老庄静游避古今。
礼仁盛业人至贵,民胞物与道长存。
风范浴火金声振,更向寰球送好音。